

我的预言

李锡胤

(黑龙江大学 , 哈尔滨 150080)

今天在这里我要讲点大话, 为我们中国文明讲个大话。我预言: 21 世纪, 在中国将会出现, 甚至可以说现在已经开始了第二次文明复兴。

在这个预言里, 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: 文明复兴绝对不能称作文艺复兴。原来的“文艺复兴”实属错误译法, 应该加以改正。

“文艺复兴”的法语原文是 *renaissance*, 法语 *re*——重新, 而 *sance*——生成、出生, 所以 *renaissance* 只有“重新生成”、“重生”之意, 并未指出是文艺的复兴。

欧洲的文艺复兴发源于十三世纪的意大利, 后逐渐扩展到西欧各国。当时意大利还是教皇统治下的神圣帝国, 从 5 到 15 世纪一直是教皇制时代, 教会控制着人们的思想。但是, 到了 15 世纪, 人们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“个人”存在于世界, 教皇制已经统治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。至此, 产生了以“人文思想”为核心的文明复兴。人文主义开始蔓延, 当时流行一句话——*Dance on fire and water*, 彰显出了人们对自己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自信。人文思潮进而催生了《人权宣言》, 人们开始关注人权, 关注自己的权利。《人权宣言》第一句 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equal, 即“人人生而平等”, 强调的就是人文主义。

14 到 17 世纪被称作“文明复兴”时期, 这一时期里涌现出大量人文主义者。彼特拉克组织翻译了《柏拉图全集》, 大大促进了文明复兴的进一步发展, 因为柏拉图在意大利, 乃至整个欧洲影响深远。还有薄伽丘的《但丁传》, 乔叟的《天路历程》以及塞万提斯的《唐吉坷德》等等。《天路历程》虽然以宗教形式出现, 却恰好起到了相反的作用, 动摇了宗教的神圣帝国思想。除了文学作品以外, 还出现了许多人文主义的艺术家, 如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、拉斐尔。他们用艺术形式来反映人文思想, 宣扬人文主义。以上是文学领域, 可以称作“文艺”, 但“文艺”二字涵盖不了“文明复兴”的广泛领域。这一时期科学开始迅猛发展, 大批思想家如哥白尼、布鲁诺、达尔文、培根等都提出许多颠覆神学的思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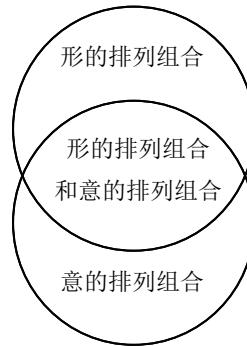
因此, 这一时期绝对不能用文艺复兴来指称。在宣告我们新预言的时候, 有必要弄清楚这一点。

第二个问题, 对于权威我们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怀疑。罗素是 20 世纪著名的哲学家、数学家和逻辑学家, 可以说是一个大权威。但是, 对于他的有些思想我们也可以提出不同看法。逻辑学里他将 if ... and then... 分开, 把实质蕴含与命题蕴含拆分开来, 他的解释是“如果前件为真, 整个命题的真与假要和后件联系起来。当前件为真, 后件也为真时, 整个命题为真; 前件为真, 后件为假时, 整个命题则为假。当后件为真, 前件是真或是假, 整个命题都为真。而我认为他实际上是把问题复杂化了, 实质蕴含与命题蕴含其实是一回事。所以我把它归纳为一句话——真不瞻前, 假不顾后, 这就避免了两个蕴含混乱, 从而可以把问题解释清楚。

为什么我要提这个问题呢？因为从语言学的研究来看，罗素的这一观点已经引起了很多不良影响。例如乔姆斯基在最后 put out（大演示）的时候，就把能指和所指的关系看成是从深层到表层的转换形式，把语言的意义与形式看成是深层与表层的转换关系，而我认为二者之间并不是深层到表层之间的转换，而是 *означающее* 与 *означаемое*（能指与所指）之间的关系。这方面，乔姆斯基没有看到汉语的能指与所指与西方语言的不同，依旧把它看作一种 transformation（转化）的结果是不对的。这一点我提出来供大家参考。

第三个问题，翻译其实是两种符号系统之间的转换问题。汉语与其他拼音文字的不同在于汉语有两种符号系统，而拼音文字只有一种符号系统，只要拼出来就可以知道其意思，用音的形式（形合）来限制意的形式（意合）。因为意的形式很活跃，掌握不住，从而用音的形式来限制它。例如俄语的第三格形式，一个词只要换成第三格形式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是个第三格意义。俄语在这方面最典型，用格来表示具体意义，而汉语没有这种形式的变化。所以语言学家归纳的汉语为意合法，西方语言为形合法有一定的道理。

语言所传达出来的一个是形式，一个是思想。翻译的关键其实是思想的转换，人们的交流实质上也是思想的交流。表面上看，似乎是语言的形式——语音控制着意义，而实质上语言只是帮助意义的传达与实现，意义交流才是人们交流的主要内容。所以在造巴别塔时，上帝搞乱的不是人们的语言，而是人们的思想。假如人们之间不一样的只是语言，而思想还一致，那么翻译只需将不同语言组织到一起就可以了，而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上次许汉成副教授向我介绍了机器翻译，机器可以直接把《毛选》大致准确翻译成俄文。这种翻译能够实现是因为有上下文给定了“意”的限制，这也刚好说明了形合与意合之间的主要组成关系。所以主要问题还是人们思想的交换，是“意”的交换。汉语在形合与意合的问题上特别复杂。因为选择很多，我用一个图来表示。



由于形式有无限种可能，意合的可能也是无限种，所以二者排列组合，即中间那一部分更是无穷个选择。那么要控制这一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弄清语言交流的主要是思想。思想是本质性的，而语言只是形式性与技术性的东西。

第四个问题：我预言 21 世纪在中国要掀起一场文明复兴，并且这次的文明复兴要比原来的复兴来得快，因为现在的社会是科技时代，电子科技高度发达，所以现代的文化传播与发展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缓慢。而我们要抓紧时间，在 21 世纪中国文明的复兴中发挥我们的作用。

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：“只有当中国文化的精髓引领人类文明时，世界历史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归宿。”这句话我非常认同与欣赏，因为汤因比看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伟大与深刻内涵。我们的文化精髓理应包括十三经：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经典作品。但是，在所有这些内容里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孔孟的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精神。诸葛亮就是这句话最典型的实践者，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是诸葛亮最大的特点。他当时躬耕于南阳，对三分天下的局势了如指掌，明明知道曹操、孙权势力强大，刘备无法与之相争，但还是决心帮助

刘备恢复汉室，“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料。臣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。”这句话充分体现出孔明的这种决心与坚强。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髓。当时孔明并没有读过《论语》与《孟子》，我推测《论语》与《孟子》是从南宋朱熹之后才开始流传开来。

这里就要提我对朱熹的一点意见，我认为他很多地方篡改了孔孟原来的思想。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记录的都是孔子、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行。《论语》是孔子的弟子跟他一起周游列国时对孔子见闻、言行的记录以及自己的感悟。这不是自传体，而是传记体。著名社会学家，也是我的老师费孝通先生说过：“自传体是自传体，传记体是传记体。”所以当有人把他写的关于自己的书说成是传记体时，他就说：“不对，我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属于自传，而传记是别人对我的评价。”费先生对这一点分得很清楚。而朱熹却把学生对孔子的记录看成是孔子的《语录》。

作为诗人的朱熹，我非常佩服他。他写的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；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非常有哲理，指出做学问一定要多方面学习，要不断有活水来补充，不断地学习。对学者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、一个不断学习的问题。但是作为一个思想家，他却是一个妥协者。他在整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经典作品时，把孔子的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这些思想全都去掉了，只谈天理，不谈人治。这就是朱熹的要害之所在。我认为，他的问题主要受南宋的局势影响。在北宋的时候主战派和主和派各占一方，主战派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。但是到了南宋，主战派已经几乎没有势力了，整个南宋社会都已看到宋朝即将灭亡，所以都屈从投降。南宋当时的一批文人也大都带有这种思想，主张投降与妥协，而朱熹正是这一典型。

第五点就是我的结论，还是汤因比的那话。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力量。这不是对中国文化鼓吹，而是汤因比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的真实感悟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也曾说过：“要了解语言，首先要了解中国话。”可见他对汉语给予了很高评价，他认为了解语言必须要研究汉语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我们中国人必须要学习好自己的文化，要读古人的书，要直接与古人为友。同时还要相互讨论，不能完全相信古人所说，应该批判地接受。对孔夫子的话也应这样，儒家思想中有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这类言辞，为了要生一个男孩而多生了多少孩子，而这给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带来了不小压力。这里我要提一个人来鼓舞我们在这方面的勇气，那就是李白。李白曾说“我本楚狂人，狂歌笑孔丘”，这句话道出了他对孔丘的不满，作为李白的远子远孙，我甘自称“哈狂人”。效法李白，作诗如下：“大时代”里哈狂人，漏鼓声声了了闻；一种蹉跎自怜意，文明复兴看强邻。（前人有“看人勃发，嗟我蹉跎”之语）

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化的科学。语言学我们要学习现代的语言学，一切都要与网络信息挂上钩，不能总是囿于前人的那一套。但是，我们要学习他们的精神，而这精神的精髓就在于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。孔明的一句“臣鞠躬尽力，死而后已”感动了一代又一代多少中国人，这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我们生在这个社会，就要为这个社会作出贡献。在现在这个阶段，我们要为人民服务。只有这样，社会才能进步。不该抱怨条件不好，不能被现实条件束缚，能尽多少力量就尽多少力量，做到这点就已经足够。

复兴，一定会现代化，但是这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大家必须要付出努力。这个对我们是一种鼓励，也是在增加我们的负担。

作者简介：李锡胤（1926—），男，浙江绍兴人，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研究员。

收稿日期：2012-08-01

[责任编辑：靳铭吉]